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

陳白淮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〇〇二年十月

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

陳白淮

論文呈交以符合哲學碩士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〇〇二年十月

論文撮要

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

陳白淮

哲學碩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理論的意識形態國家，然而意識形態不是任何時候都左右了中國的外交戰略的。

當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內政、外交上處於主導位置時，通常不會出現務實的外交戰略。但是當國家陷於政權的生存、鞏固和安全的危機時，就會出現例外。

當國家總體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經濟，意識形態相對淡化時，務實外交戰略就大行其道。

就中國的務實外交戰略的本質而言，中國本國的國家利益仍然是指導中國外交戰略的最高原則，其務實的本質與國際政治學理論中的實在主義並無根本的不同。然而，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實行務實外交戰略是有不同的，前者僅是外交戰略中的例外，後者則是常規，而非例外。

不論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在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前者為中國鞏固新生政權和化解國家安全危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後者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環境，使中國的經濟得以維持了二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現了曙光。

茲聲明本論文《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為本人研究成果，並未作任何刊物發表。

陳白淮

二〇〇二年十月

目 錄

總目錄	—
鳴謝	
第一章 導言	1—10
1.1 面對中國的崛起，中國外交戰略成爲關注的焦點	1—2
1.2 論文擬研究的問題及其重要性	2—4
1.2.1 研修課題的確定	2—4
1.2.2 重要性	4
1.3 論文研究的目的與研究範圍	5—6
1.3.1 論文研究的目的	5
1.3.2 研究的範圍	5—6
1.4 研究計劃與提綱	6—8
1.4.1 研究計劃過程總結	6—7
1.4.2 提綱	7—8
1.5 相關著作評介	8—10
1.5.1 中國學者著作評介	8—9
1.5.2 外國學者著作評介	10
第二章 毛澤東時代外交戰略具有務實性的一面	11—29
引言	11—13

2.1	“一邊倒”外交戰略中的務實性	13—19
2.1.1	中共外交選擇空間	13—14
2.1.2	委曲求全的代價	14—17
2.1.3	“一邊倒”的利益落到實處	17
2.1.4	小結	18—19
2.2	外交戰略重大調整體現了外交戰略務實性的一面	19—28
2.2.1	兩面出擊源於意識形態	19—22
2.2.2	巨大安全壓力是戰略調整的前提	22—26
2.2.3	務實者利	26
2.2.4	小結	27—28
	總結	28—29
第三章	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	30—53
	引言	30—31
3.1	鄧小平先生對和平與戰爭的新判斷體現務實的外交戰略觀	31—37
3.1.1	鄧小平先生的“新判斷”	31—32
3.1.2	鄧小平先生關注和平問題的背景	32—34
3.1.3	向客觀求答案	34—36
3.1.4	“新判斷”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大局的意義 ...	36—37
3.1.5	小結	37
3.2	“一條線”戰略的調整是務實外交戰略的典範	38—44
3.2.1	“一條線”戰略的形成和發展	38—39

3.2.2	調整“一條線”戰略的背景分析	39—41
3.2.3	戰略調整過程是鄧小平先生外交戰略成形的過程	41—43
3.2.4	小結	43—44
3.3	尊重現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鄧小平務實外交戰略的體現	45—51
3.3.1	全面改革開放下追求大一統的隱憂	45—47
3.3.2	“一國兩制”的概括力	47—48
3.3.3	“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徵	48—49
3.3.4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務實的智慧	49—50
3.3.5	小結	50—51
	總結	51—53
第四章	內容總結及主要論點	54—56
4.1	論文內容總結	54—55
4.2	論文的主要論點	55—56
	參考書目	57—60

鳴 謝

我衷心感謝論文導師熊玠教授、任越教授在這三年以來的悉心教導和指引！如果沒有導師的耐心栽培，我相信這篇論文是無法完成的。

第一章 導 言

1.1 面對中國的崛起，中國外交戰略成爲關注的焦點

1989年，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這六個原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改變了政治、經濟體制，德國統一，標誌著東方社會主義陣營開始瓦解，至1991年，執政七十四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實際上宣告了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壽終正寢。與此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中國於1989年6月4日爆發了建國近四十年裏不曾發生過的政治風波，並招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七國的制裁，使中國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之中。因爲蘇聯的解體，中國這個尚存的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在冷戰結束、新舊國際秩序更替的轉折時期，備受世人矚目。此時西方有人推測中國將會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也在“多米諾骨牌”的效應中垮臺。但是，西方經濟界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的人士卻從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料中驚人地發現，正在崛起的中國將在二十一世紀成爲世界超級大國。隨之，西方馬上有人借用“崛起 擴張 威脅”的邏輯，以歷史之“必然”創造出了“中國威脅論”種種。一時間，圍繞中國崛起的問題也成了世人關注的熱點。

彈指間十年過去，社會主義中國既沒有垮臺也沒有擴張的跡象，相反，它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二十餘年的經濟高增長，並且在1997年亞洲爆發的“金融風暴”中以亞洲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爲防止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並加快復蘇起到了衆所公認的積極作用。在新世紀之初，中國完全沒有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倦容，它以自信蓬勃的氣質吸引著全世界的投資者，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引用美國負責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1995

年所說的話：“問題不是中國是否將成爲全球和地區安全事務上的主要大國，而是何時和如何成爲這樣的大國”。

隨著近二十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世人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勢必影響亞洲乃至世界的地緣關係，其影響的分量也將伴隨崛起的腳步越來越重。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與中國有重大利益關係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俄羅斯以及歐洲主要國家都予以極大的關注。中國的外交戰略及其未來的政策走向也逐漸成了國際政治學界的關注焦點。

1.2 論文擬研究的問題及其重要性

1.2.1 研修課題的確定

這幾年來與研究中國外交歷史和外交戰略相關的文章和專著出版不少，感覺極具參考價值，很受啓發，爲我選擇研修題目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鑒。特別是臺灣和國外的一些媒體近年來時而出現的“中國奉行務實外交戰略”的提法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並對我確定研修課題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其一，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國家，其意識形態是中國社會得以穩定、政權得以鞏固的重要基礎。因此，在中國制定其戰略時，也往往不可以違背其意識形態。鑒於這樣的認識，人們通常認爲：中國這個意識形態國家的外交戰略必然受其意識形態左右，甚至國際政治學界還有人懷疑“實在主義”能否解釋中國的外交戰略。然而，正是這類觀點與上述“中國務實外交”提法的相悖，引發了我探索的熱情，但更令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外交戰略是否確實具有務實的一面，尤其是其務實的本質與國際政治理論所認爲的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都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作爲其外交指導原則的實在主義是否一致（實在主義即是 Hans Morthenthau Kenneth Waltz 所主張的 Realism），可惜的

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 國際環境評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 頁。

是，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學者對此一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課題展開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然而這一遺憾卻為我的研修提供了一個十分寶貴的空間。

其二，關於“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首先，“務實”二字在漢語字典中的解釋為“講究實際，不求浮華”，其中的關鍵在於講究實際，“講究”可以解釋為重視，重視是一種主觀性。而“實際”則可以解釋為客觀存在的事情。結合起來這裏面就反映出了一個具有哲學性質的解釋：務實即是強調主觀去符合客觀。當我們進而把這一解釋引入到外交上時，我把“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界定為：為了國家的利益，以淡化、削弱、改變甚至放棄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去換取獲得外部世界的合作或者換取獲得與外部世界的和諧的外交戰略，並且這種務實往往伴有在制度未改之前對政策進行調整修改的現象。

其三，中國外交戰略的務實性問題。迄今為止還僅是出自媒體的一些提法，但要把它作為一個學術課題，必須具備一定的研究基礎，我認為：通常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當它還在弱小時，為了生存或者當它為了取得外部的支援與合作時，它往往必須壓抑主觀意志向外部客觀世界做出某種讓步和妥協，這一規律就是務實性的特徵。而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中共政權，在八十多年前僅有數十人之眾，而如今已成了世界第一大黨，並且正在領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走向民族的復興，中共及中國的成長史十分典型，所以中共政權也應具有某種“務實”的特性。當這一特性被延伸到其對外戰略或外交政策上，也就必然顯現出具有務實的一面。因此，把中國外交戰略的務實性問題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課題，我的結論是：其具備較好的研究基礎。

上述三點融合在一起，我確定了這樣的研修題目：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基於本題目，基於“人們通常認為中國這個意識形態國家其外交戰略必然受其意識形態左右”，基於上述三點中的“三”，即“中國政權具有

《標準漢語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11 頁。

務實特性”，我既無法作出中國的外交戰略都是務實的假設，同樣也無法作出中國的外交戰略都受其國家意識形態左右的假設，我認為合理的假設有二：

第一個假設是中國外交戰略具有務實性的一面，且務實外交在達到危機或有重大外來挑戰或有特殊戰略需要時，尤其可能會產生，也更重要。我的這一個假設並不是完全針對於整個中國五十年外交而言，準確地說是針對十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時代。

第二個假設是鄧小平時代外交的務實性最為顯著。這個假設對應了十分強調經濟建設的鄧小平時代，並且與媒體所提的“中國奉行務實外交戰略”專指鄧小平時代是一致的。

由於我的研究將力求做到對中國外交戰略順藤摸瓜、刨根溯源，以期能解釋具有本質性、規律性的問題，我準備運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個理論來做研究。當然，從理論上來講，外交在一定條件下將影響內政甚至改變內政，但這個問題不是本課題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研究中不做具體展開。

1.2.2 重要性

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明最古老的國度之一，這個國家在中共領導下，經濟正在崛起，綜合國力正在提升，在世界“一超多強”的格局中，中國勢必成爲“強”中的一極。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亞洲乃至世界的地緣關係，並且將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新秩序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不論我們予以多大的關注都是恰當的。此外，我的研修題目十分新穎，至今尚無學者做過專門論述，並且我感到我的研究很有可能獲得具有價值的結論，使這個研究成果有可能爲研究中國崛起後的外交政策走向提供重要的參考。因此，我所研修課題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1.3 論文研究的目的與研究範圍

1.3.1 論文研究的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不僅僅爲了求證中國的外交戰略具有務實性，我希望通過本課題的研究，最終能把握中國務實外交戰略具有根本性的特徵和規律，並希望由此能進一步找到中國外交戰略調整機制帶有根本性的因素，建立分析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理論，這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1.3.2 研究的範圍

我的研修題目是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及效果。如果就題論範圍，研究應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五十多年的外交史，從 1945 年至 1976 年爲毛澤東時代，1977 年以後爲鄧小平時代。中國這段外交史跨越了國際政治的兩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5 年—1992 年的兩極合作與對抗的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操控著世界的大勢和格局。對於這一階段的研究，應該始終將重點放在把握中美、中蘇這兩對關係上，並兼顧其餘。第二階段是從 1992 年蘇聯解體後至今，世界上僅存一個無任何國家的綜合國力可比擬、可對抗的全球性超級大國——美國，世界格局處在“一超多強”的階段。對於這個階段的研究，就應該以中美關係爲重點，並兼顧其餘。

由於本研究課題的重點是外交戰略，因此，要特別注意對與中國外交戰略、外交政策以及重大外交活動有關的史料和研究專著的學習及分析。此外，研究中國外交戰略就必然要涉及新中國外交戰略的形成。衆所周知，在中國建國之前，世界已形成了以美蘇爲首的、以意識形態爲分野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格局。由於美、蘇在華均有利益，因此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都程度不同地介入到了中國的政治。基於新中國外交戰略的形成必然受美、蘇與中共關係的影響，甚至這種影響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因此，研究新中國外交戰

略的形成就必須涵蓋共和國建國前中共與美國、中共與蘇聯的關係。

既然把“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一論點運用到了本課題的研究，我就必然要把研究範圍由外交深入到內政，這樣做才能刨根溯源。在內政方面研究的範圍應該包括：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學說、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概念以及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的國家戰略，並且對建國以來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政策方面的重大調整必須有所研究，否則對內政的把握就極易出現偏差。

1.4 研究計劃與提綱

1.4.1 研究計劃過程總結

1998年10月—1999年5月

在熊玠導師教導下開始逐漸掌握研修的目的、選題、研究理論等研修相關方面的知識，並開始閱讀與研修內容相關的文章、專著，初步確定了“中國實施務實外交戰略的必然性及其目的與效果”的題目。

1999年6月—2000年5月

學生在導師指導下開始使用所掌握的研究理論邁入研修實踐，學生的領悟由淺入深，輪廓也逐漸分明，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有了深入的感覺。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再次將研修題目作了修改，最後確定為“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與效果”，明確了研修的宗旨，並開始確定了1.2.1小結所提到的兩個假設，這兩個假設成了研究的主體框架。

確定採用文獻查閱的方法進行研究，必要時結合對人物的專訪。

2000年5月—2001年3月

這是研修全面展開的重要階段，並且將很快進入研修的論文整理、準備答辯階段。此時發生了一個枝節，原來我曾經正式向校方申請於2000年11月

開始進行校內答辯，2001年3月進行校外答辯，但校方提出二年半的研修期過後才准進行論文答辯，因此沒有同意我的申請。我一下子就過分放鬆了，沒有一鼓作氣完成論文。

2001年4月至今

也許是論文的準備中途擱置的原因，也可能溫故知新的原因，我發現了原擬準備中的論文裏視野略顯不足。為此，學生在這段時間又重新翻閱不少的專著，在熊教授的多次指導下對論文作了相當大的調整，並準備6月30日前完成論文的定稿。

聲明：由於學生研修上的原因，加上學生本身工作確實十分繁忙，故拖延了畢業時間，責任當由學生本人承擔。不過這段時間的補習對於研修的結果是十分有益的。

1.4.2 提綱

- 一． 確定研修題目和假設，對關鍵字進行定義，說明所用理論。
- 二． 把握新中國“一邊倒”外交戰略的形成，引用“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探索其中的務實成分以及務實目的，並檢驗其效果。
- 三． 把握毛澤東時代的建國和治國理論以及其內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脈絡、重大政策調整的內外因，引用“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尋找毛澤東時代具有務實外交戰略特徵的外交戰略案例，分析每個案例務實的本質和目的，檢驗其務實的效果。
- 四． 把握鄧小平時代的治國理論及其內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脈絡、重大政策調整的內因，引用“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總結歸納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案例，分析主要案例務實的本質和目的，檢驗其務實的效果。
- 五． 把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國家的戰略、務實外交戰略的本質進行綜合

分析比較，找出其中的差異性，總結出中國採用務實外交戰略的規律。

1.5 相關著作評介

1.5.1 中國學者著作評介

我所學習過的著作大約分為三類：

一．側重於史實性的著作

這類著作主要是以紀實為主，內容一般都較為客觀詳實，但觀點較少，甚至基本沒有觀點，吳冷西所著的《十年論戰》就具代表性。此類著作還有一種較令人遺憾的情況就是，著作中對於一些較敏感的史實基本沒有涉及。例如：朝鮮戰爭到底誰是戰爭的挑起者的史實上，我曾看到過個別著作當中提到了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前，朝鮮的金日成主席曾向毛澤東主席說明瞭統一朝鮮的準備，而中共讓在人民解放軍中的朝籍官兵返回朝鮮人民軍，是中共支援金日成主席統一朝鮮的實際行動。爲了核實這一提法的真實性，我查閱了許多史實性的著作，但沒有一本著作涉及這個問題，就連身爲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的彭德懷所著的《彭德懷自傳》裏也完全回避了這個問題，令我十分茫然。雖然我至今無法證實這一提法的真實性，但是讓我同樣感到困惑的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後朝鮮人民軍的戰役行動確實體現了戰略上的主動態勢和明顯有備而來的痕迹。另一方面從美國政府所公佈的歷史資料卻未發現韓國和美軍方面有發動統一朝鮮的軍事準備的史實。這些迹象令我無法排除朝鮮是戰爭的挑起者的印象，進一步說，如果朝鮮是朝鮮戰爭的挑起者，我也無法排除在當時中朝兩國兩黨關係如此密切的情況下，中國對朝鮮要發動統一戰爭會完全置若罔聞。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它影響到了人們對各方戰略動機及道義上的判斷。

這類以紀實爲主的著作的作者多數是開國元勳、老外交家或長期在中共領導人身邊從事理論工作的學者。

二．側重於總體戰略理論研究的著作

這類著作主要是運用較符合中國意識形態的觀點進行系統化的論述，其論點明確，論據有力，思路十分清晰。他們做了很好的整理工作，使中國三代領導的外交戰略及思想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較傳統，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裴堅章主編的《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裴堅章主編的《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王泰平主編的《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葉自成所著的《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但較為遺憾的是，我沒能從中讀到一些在歷史上已經被證明是有錯誤的戰略思想進行較系統的論述。例如：對於六十年代毛澤東在外交上的四面出擊最後導致四面楚歌的局面，很明顯地說明瞭這是外交戰略上的極其嚴重的錯誤。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學者基本上都有提及並且都較簡單地將此錯誤歸於極左錯誤的結果。但客觀地說，這類看法實在不夠全面，不夠深刻，說服力不足。

這類著作的作者多數是在中國成長起來的。

三．側重於未來戰略研究的著作

這些學者觀念比較新，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比較接近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水平，其著作研究的系統性比較強，視野開闊，客觀理性，理論紮實。他們擅長於運用當代國際政治理論去說明、解釋中國的外交戰略。這些著作多數關注未來中國外交戰略，具有明顯的國際觀。例如：在研究中國新世紀外交戰略的專著裏，這類著作十分強調針對研究的內容建立一個客觀、理性、科學的研究理論框架，這個框架的立足點往往不僅是中國外交戰略本身，甚至是站在全球戰略和中國的地緣關係的角度反過來審視中國的外交戰略，以及從中發現規律性的問題及尋找對應辦法，閻學通等著的《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是其中較典型的代表之一。

此類著作的作者群主要是中國自己培養的出國留洋的學者。

1.5.2 外國學者著作評介

由於受文化背景、價值觀念以及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瞭解不深所限，外國學者對中國外交戰略的研究著作往往很難令中國人信服。例如：美國學者吉姆·赫爾姆斯（Kim R.Holmes）和詹姆斯·普裏斯特（James J.Przystup）在研究中美關係的專著《外交與威懾：美國對華戰略》（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中說：“隨著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日漸高漲”，他們認定中國的民族情緒與中國的實力增長有關，而中國人認知的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現代中國民族情緒的發生基本上都是起因於中國主權和民族感情受到傷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發生“台海危機”、“南聯盟使館被炸”、“南中國海撞機事件”期間，中國爆發了三次民族情緒，這些情緒的誘因都是“受辱”引起的，與中國的實力增長毫無關係。當然，他們有些角度較為新穎、客觀，有一定的啓發作用，至少能幫助中國學者瞭解到外國學者對中國的陌生程度。由美國學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羅絲·芒羅（Ross H. Munro）所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也屬於此類著作。

綜上所述，在我的研究過程中，上述不同的學者都給了我不同的啓迪，對我建立對中國外交戰略的基本情況以及各類觀點的認識幫助很大。但是，由於上述著作與我的研究任務和目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可借鑒的觀點不太多。

吉姆·赫爾姆斯和詹姆斯·普裏斯特所著《外交與威懾：美國對華戰略》，新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頁。

第二章 毛澤東時代外交戰略具有務實性的一面

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共根據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建立起來的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內政方面，毛澤東主席根據“肅反”、“三反”、“五反”，特別是“反右”和蘇聯出現否定史達林政治路線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等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強調在一切領域裏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幾乎貫穿了始終，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在 1966 年發動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發展到空前絕後的頂峰。在外交戰略上，毛澤東主席鑒於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歷史，結合中共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以及世界冷戰格局的客觀環境，並根據中國的客觀現實，始終十分強調維護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在對時代的判斷上始終堅持世界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列主義傳統觀點，到了六十年代更進一步提高為“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在上述理論主導下，外交上實際奉行著一條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支援世界革命（輸出革命）為己任的、具有明顯意識形態特徵的主導性政策。六十年代，當中蘇意識形態論戰加劇後，毛澤東主席在“反對美帝國主義”後面加上了“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中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最終釀成了國家之間的對抗。

在毛澤東時代，內政、外交上幾乎沒有一件重大事件、重大決策不是淵源於意識形態或與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的，這種唯意識形態的鮮明特徵也許就

何方：《論和平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頁。

是人們冠以中國“意識形態國家”的緣由所在。

當然，本引言的目的絕非在於求證中國是否“意識形態國家”，而是爲了在研究展開之前對中國意識形態建立一個認識的框架，並以這一認識爲基礎，進一步分析：在毛澤東主席把意識形態強化到登峰造極的背景下，中國外交戰略是否完全被意識形態所左右，中國外交戰略是否存在務實的一面。

在對毛澤東時代外交戰略是否存在務實性的觀察挖掘、探索研究中，我承認在毛澤東時代其內政外交的意識形態原則始終沒有改變，並且其意識形態歷經了一個由四十年代後期形成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逐漸清晰化、系統化、完善化的過程。通過對這個過程的認識，可以下一個基本結論：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由意識形態立場基本主導中國內政外交的時代。因此，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戰略就其總體而言，基本上不能認定是“務實外交戰略”，但是有如下兩個例外。

一是，新中國奉行的“一邊倒”戰略即可理解爲“依靠人家”。俗話說“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這其中必有爲顧全大局而不得不委屈主觀意志的成分。顧名思義，“一邊倒”戰略已經具備了務實性的特徵。

二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出現了與自身意識形態立場“大反常”的重大戰略變化。中國和蘇聯這兩個馬列主義的同門弟子由五十年代一致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略同盟，變成了兵戎相見的冤家對頭，而中國人民的宿敵“美帝國主義”卻成了與中國人民共同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同盟者。這其中的調整幅度之大，令人難以置信。從中似乎我們也應該敏感到“務實”是否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本章的目的是要證明我的第一個假設，即在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活動幾乎無一不是淵源於意識形態或與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的情況下，外交戰略也還具有務實性的一面。要證明這個假設並不困難，因爲，實際上只需要證明上面提

到的兩個“例外”具有務實外交的基本特徵就可以了。

2.1 “一邊倒”外交戰略中的務實性

2.1.1 中共外交選擇空間

1949 年初中共發動的“三大戰役”大獲全勝，百萬雄師已飲馬江邊，中共奪取全國勝利的大勢已基本奠定，建國問題驟然擺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對中共而言，在面對當時世界已形成美蘇為首的兩個意識形態陣營尖銳對峙的冷戰環境下，在建國後要想保持政治上的完全中立是十分困難的。一是成立國家必須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接納和承認；二是積貧積弱的中國面臨著內外安全環境的極大壓力（主要來自臺灣國民黨殘餘政權及支持者美國），沒有國際上的支援，政權的鞏固將成問題；三是中共是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農民起義軍”，對於立國治國、金融經濟、工業交通等一竅不通，人才更是極端匱乏。在此情況下，中共必須選擇投靠“兩大陣營”中的一個，以獲取幫助和支援。但是投靠敵視中共的美國，顯然除自取其辱外，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倒向蘇聯尚具有一定的基礎。

中共和蘇共均為馬列主義政黨，且中共是在蘇共直接扶持下成立起來的。歷史上雖然蘇共幫了中共不少忙，但也因指揮失誤給中共造成巨大損失。二戰後，蘇聯選擇了在中國支援蔣介石總統的國民黨政府，並與中華民國簽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在國民黨政府垮臺前，要求蘇聯公開全面支援中共在外交上存有一定障礙。此外，史達林在對毛澤東主席和中共的認可上素有保留，1942 年他對即將來華任蔣介石軍事顧問的蘇聯崔可夫將軍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民族主義傾向非常嚴重、國際主義感發揚不夠的黨”。史達林還在與美國政要交談時把中共形容為“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人”、“不過是一

[蘇]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革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新華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 頁。

群一旦經濟處境改善就會忘記政治傾向的土地改革者”。當 1948 年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問題出現以後，史達林對中共又多了一層疑慮。反過來說，蘇聯在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後一直持“坐山觀虎鬥”之態，中共對此也十分不滿。但是形勢迫人，爲了新中國順利誕生、政權的鞏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共除了委曲求全倒向蘇聯，實在別無它途可尋。即使如此，也存在相當的困難。

2.1.2 委曲求全的代價

中共在具有鮮明反帝色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成功之際，其外交上的原則和政策也已基本形成。1949 年 3 月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明確宣佈：“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治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周恩來總理在建國前明確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其獨立自主的關鍵就在於“不要置身於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周恩來總理還說：“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因此，中共以“一邊倒”向蘇聯主動求和的政治姿態換取史達林的信任，力爭取得進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入場券，進而使“一邊倒”的戰略實現其利益的落實，爲此，中共則不得不付出了如下的主要代價：

一，爲了消除史達林所擔心的一旦中共奪取全國勝利後會變成“南斯拉夫第二”的疑慮，以換取蘇聯的信任，毛澤東主席特別給九國共產黨情報局寫文章，嚴厲批判了南斯拉夫鐵托政府的對蘇政策，明確說明“二戰後美國已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蘇聯成爲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爲了表示與

裴堅章等著：《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7 頁。

裴默農著：《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頁。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頁。

蘇聯保持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府立場上的一致性，當建國後南斯拉夫主動承認新中國，並希望與新中國建交時，爲了避嫌，不得罪史達林，中共竟把建交一事拖到史達林去世後。在赫魯雪夫已經改善對南斯拉夫關係的情況下，中國才與南斯拉夫建交。中國在外交上對南斯拉夫的做法使中國外交主權和尊嚴受損。

二，外蒙古本屬中國領土，1911年沙俄趁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清王朝瀕臨覆滅之際，煽動外蒙古獨立，以後又派兵進入外蒙古。俄國十月革命後，在蘇維埃俄國支援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外蒙古脫離中國處於蘇聯控制下，然而在法律上作爲原主權國的中國，沒有一屆政府承認過蒙古的獨立。在美國和蘇聯聯手壓迫國民黨政府於1945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以“維持外蒙古的現狀”的方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這份協定對於中國而言當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當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向米高揚就要求收回外蒙古問題做出試探時，米高揚當場明確地拒絕。事後，史達林得知中共的想法，立即給中共來電，以同樣斷然的態度回絕毛澤東主席的要求。此後，中共爲了顧全大局再也沒有就外蒙古問題力爭了。這裏我必須指出的是，如果外蒙古的背後沒有蘇聯的插手，沒有蘇聯的利益，毛澤東主席不會就此作罷的，因爲毛澤東主席完全違背了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佈的“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的政策。在這件事上，中共在原則和主觀意志上向蘇聯作出了重大的妥協，繼國民黨政府之後，也咽下了這個“不平等”的苦果。

三，周恩來總理曾表示，蘇聯在將中長鐵路移交給中國後可以繼續沿這條鐵路調運軍隊。據此，蘇聯在送交給中方的議定書草案中寫下了“蘇聯軍隊應可以沿滿洲里到海參崴這條鐵路進行調動”。周恩來總理爲此提出：一是

裴堅章等著：《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這種調動必須以受到戰爭威脅為條件”；二是“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使用蘇聯境內的鐵路從東三省向新疆進行調動”，以示雙方權利對等。但這一條最終沒能寫入協定中。中國要求平等的主張沒有得到蘇聯應有的尊重，中國政府作了讓步。

四，“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三億美元的低息貸款，附加條件是從1950年到1963年的十四年裏，中國必須把它所有過剩的工業原料統統賣給蘇聯，而不得賣給第三國”。出於無奈，中國的商業貿易又接受了蘇聯不平等壟斷的現實。

五，“蘇聯堅持在幫助中國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屬等工業方面要實行合營”，為此，中方與蘇聯方面商定了成立上述相關的四個合營公司的協定。但結果是，這些企業沒有成為主要目的在於利用蘇聯的資金和技術幫助中國發展上述四方面工業的載體，反而幫蘇聯從中國獲得了其國內缺乏的軍事工業急需的稀有金屬。對於這件事的評價，我們可以借用赫魯雪夫的評語“聯合開發新疆的礦物資源，這個條約是史達林的一個錯誤。我甚至要說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

六，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期間發生了國民黨空軍空襲上海，造成上海水電供應大面積癱瘓的情況，中方提出要求蘇聯派空軍保護上海，史達林同意了中方的要求，但借此提出要與中方簽訂一個秘密的《補充協定》，內容是：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在中國的東北和新疆地區，“不給予外國人的租讓權利，並不准許第三國的資本或其公民的直接或間接形式所參加之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社會與團體的活動”。因本協定是蘇聯單方提出的，且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是否實行租讓或接受外國投資與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311頁。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頁。

中國無關，中國也無此要求，從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蘇聯以把其遠東和中亞包括入協定內容的目的，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其將新疆、東北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實際上的不平等，就其本質而言，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使中共領導層蒙受了感情的傷害。但是爲了顧全大局，中共還是被迫作出了讓步。

2.1.3 “一邊倒”的利益落到實處

中共選擇“一邊倒”外交戰略的過程中付出了代價，但獲得的回報是巨大的。

使新中國在境內國民黨殘餘力量和外部美國爲首的西方敵視的雙重壓力下，得以迅速站穩了腳跟，利用大國關係的制衡和增強自身抵抗外來侵略的實力，鞏固了新中國政權。

使中國提早二十年收回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所約定的蘇聯在華特權。

使新中國成立後就立即獲得了蘇聯財政和經濟方面有力的援助。從 1952 年至 1955 年，蘇聯爲新中國提供了 11 筆共約 17 億美元（約 58.6 億舊盧布）的低息貸款（年息 1—2%）；1950 年至 1954 年，中國與蘇聯陸續簽訂了三批“蘇聯供應成套設備建設專案協議書”，蘇聯向中國提供了 156 個成套專案的建設設備；1955 年至 1959 年，中蘇又簽訂了蘇聯向中國提供新成套專案的協議書，新增援建的成套專案數達到 148 項；從 1949 年至 1959 年，隨專案來華參加援建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專家達八千多人，爲中國培訓了七千多名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同時中國還從蘇聯和東歐獲得了四千多份的技術資料。上述這一切對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國防實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5、56 頁。

2.1.4 小結

本節重點討論了中共選擇新中國“一邊倒”戰略的“失”和“得”，目的主要不是去研究中共選擇“一邊倒”是否失之有理、得之有據，更不是為中共的這一戰略進行全面評價，而是透過探明中共外交上的主觀意志（原則）實行“一邊倒”過程中的“失”和“得”這三者以及其中的關係，來研究分析中共新中國外交的“一邊倒”戰略是否具有“務實外交戰略”定義的主要特徵。在中共主席毛澤東和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在 1949 年新中國外交原則的宣示裏，我們應該把握其中的原則在於“獨立自主”、“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不要置身於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實際上“一邊倒”的戰略選擇本身就已經違背了“不要置身於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的主觀原則，具備了明顯的“務實外交戰略”的特徵。雖然毛澤東主席本人對“一邊倒”曾有“一邊倒”不意味放棄獨立自主的說明，但是無論如何，在當時中蘇實力對比差別巨大的情況下，中共又急於獲得蘇聯的支援，要完全做到不受蘇聯的影響，顯然是不可能的。在實行“一邊倒”戰略過程中，中共在主觀立場上對上述問題都已經據理力爭，但在遭到拒絕的情況下，為了通過外部世界的合作以獲得建國的信心、安全和依靠、經濟的支援與建設的幫助，這些均帶有決定性意義，系關政權生存的戰略利益，中共做出了著眼於全局的放棄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的原則性的妥協。綜上所述，我認為，新中國的“一邊倒”外交戰略，不論其動機還是實行的過程，都具備了“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至此，本節的目的——求證“一邊倒”外交戰略中的務實性已經達到，至於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實際上也已在文中說明了。有意思的是，毛澤東主席在史達林去世、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許多場合，經常十分不滿地說：“1950 年我和史達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訂立互助同盟條約、中長鐵路、合股公司、國境

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裏……”¹，毛澤東主席這口怨氣的宣洩為新中國“一邊倒”是“務實外交戰略”的定論作了精闢的注腳，而其中的委屈卻恰恰道出了“務實”的代價。

2.2 外交戰略重大調整體現了外交戰略務實性的一面

2.2.1 兩面出擊源於意識形態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否定也體現了無產階級統治對於資產階級統治的否定”²，因此，自俄國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起，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與社會主義蘇俄之間你死我活的較量就已經開始了。二戰期間，反法西斯的共同戰略利益促使雙方擱置意識形態的對抗，結成戰略同盟關係。二戰勝利後，逐漸形成以意識形態劃線形成的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與美英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峙局面。

中共基於“美國敵視中國”和“自身與蘇共共有的馬列主義血緣及自身政權穩固的需要”的原因，在建國前後即完全“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在兩大集團對峙的國際戰略態勢中，在遠東扮演了東方陣營的一個“先鋒”、“鬥士”的角色，並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再次結怨（前有八國聯軍侵華）。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採取了經濟上全面封鎖、軍事上全面圍堵的遏制戰略，企圖壓迫中國就範。而毛澤東主席則高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大旗，一方面在朝鮮、臺灣海峽、印度支那甚至印度與美國展開角力，另一方面支援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

孫其明著：《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4 頁。

王惠岩主編：《政治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8 頁。

運動。“至少在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多數時間裏，中國政府為援助亞、非、拉美各國革命運動，不僅傾其所有，甚至可以不計後果，就是在六十年代初，中國經濟嚴重困難的幾年裏，其援外金額仍超過其償還蘇聯債務的十幾億美元的總額”。在中美的戰略對抗中，中國由地緣戰略中的一個棋子上升為地緣戰略中的棋手，不幸的是，當中國這位新手與美國強大敵手的對弈剛開始不久，中、蘇兩個同盟兄弟為了意識形態的分歧，又擺開了另一局棋。

中共與蘇共的“十年論戰”就其本質而言，兩者在意識形態方面確實存在著尖銳的分歧。一是，毛澤東主席堅持世界是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強調的是暴力革命，而赫魯雪夫則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蘇聯外交戰略的總路線。二是，毛澤東主席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而赫魯雪夫則提出“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毛澤東主席批評赫魯雪夫的主張是對馬列主義的“修正”和“背叛”，赫魯雪夫則指責毛澤東主席是馬列主義的“教條”。吳冷西先生所著《十年論戰》一書中所記載的毛澤東主席在論戰過程中講的一段話，精確地概括了中蘇分歧的焦點：“現在我們跟赫魯雪夫的分歧，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雪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

雖然中蘇之間的分歧在初始階段更多的是表現在觀點上的不同，但是背後確實存在著兩國基於各自所處不同內外部環境所決定的不同戰略利益的考量。不過最終把意識形態論戰演化為對抗和衝突的原因絕不是上述分歧本身，而是兩國領導人所採取的一系列失當行為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所致。例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40 頁。

吳冷西著：《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0 頁。

如，當赫魯雪夫向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中蘇共組“共同艦隊”的事，對於這樣的問題，通常在戰略同盟國之間爲了共同的戰略安全，這至少是一個可以商量討論的話題，即使被動方不同意，以婉言謝絕也十分正常，而毛澤東主席則在赫魯雪夫提出建議時大發雷霆，強烈抨擊蘇聯，影射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甚至把爲了落實“一邊倒”戰略利益中共主動要求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相關協定中史達林的一些大國沙文主義條件，在赫魯雪夫已經改正的情況下，也搬出來攻擊對方。這樣的做法無論如何是令對方感情上難以接受的。而赫魯雪夫則能作出一夜間撤走所有援華專家的毀約失信行爲，使中國蒙受了重大的經濟損失。兩國領導人的一系列不夠理性的行爲使得中蘇兩黨的矛盾衝突逐漸推向白熱化的程度，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要想再使這種激烈的相互攻擊停止下來，不僅在毛澤東與赫魯雪夫之間已不大可能，就是在兩黨和兩國民衆的情感上也不大可能了。就外交戰略而言，毛澤東主席與赫魯雪夫之間的交惡既不是意識形態分歧的必然，更不是當時地緣戰略利益的必然，可以說是兩個感情用事的棋手下了一盤對兩方都無益的棋。特別是對中國而言，建國不久，內外安全環境尚未完全穩定，美國對中國還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共卻在“打嘴仗”當中失去了“一邊倒”找回來的“幫手”，使中國的戰略安全過早地失去了重要的依託，並且蒙受了蘇聯毀約造成的巨大損失。

在本節上述的研究和清理中，我們首先已經證實了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裏，中國的外交戰略明顯地擺著“把中國作爲‘世界革命中心’，在意識形態領域裏舉起了‘反帝、反修’兩面旗，進行了兩條路線的鬥爭，使中國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國際環境之中”。

此外，通過本節上述的分析，我們還清晰地觀察到，五十年代形成的由

孫其明著：《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1—338 頁。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 頁。

中蘇同盟共同對付美國的不對稱“三角關係”正在向等距“三角關係”演化，而這緩慢的微妙變化過程正是中國戰略安全環境日趨惡化的過程，它預示了一場危機的降臨。

2.2.2 巨大安全壓力是戰略調整的前提

在中蘇關係惡化到戰爭邊緣之前，美國雖然早已對中國形成了從遠東朝鮮半島、日本琉球群島、東至臺灣、南至越南的半月形戰略包圍圈，給中國構成了相當大的安全壓力，但由於中國有北臨同盟國蘇聯和外蒙古的數千公里安全邊境，所以中國的安全環境還仍然具有相當大的迴旋餘地和戰略縱深。可是當中蘇兩國軍隊於 1969 年 3 月在處於國境線上的珍寶島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以後，這數千公里寬的“後方”驟然變成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數千公里寬的戰場正面。我們不得不承認當遭受兩頭猛獸一前一後夾擊的時候，再強悍的獵人也要驚出一身冷汗（除非珍寶島衝突是中共預謀的結果）。在珍寶島武裝衝突之後，一方面蘇聯不斷在邊境製造“摩擦”，另一方面蘇聯外交官則公開宣稱“中蘇衝突無法避免”，其國防部官員又發出了“蘇聯戰略火箭隊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擊中國的部署”的戰爭威脅等等，不斷惡化的局勢使毛澤東主席對安全擔憂到了極點。以下例子可能提供對這一情況的體驗。

1969 年 8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佈緊急文件，宣佈成立由周恩來總理任組長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迅速組織疏散城市人口，遷移工廠，號召廠礦企業職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開始深挖洞、廣積糧，以備核大戰之需。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緊急發出毛澤東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令》，要求“新疆的黨政軍隨時準備對付蘇聯的大舉進攻，防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0—513 頁。

止突然襲擊”。中央軍委命令東北、華北和西北的部隊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9月11日，在蘇聯要求下，中國總理周恩來和蘇聯總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作途經會晤，兩方比較坦誠，雙方在互派大使、擴大貿易和兩國間通車通航等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情況出現了緩和的徵兆。但戰爭弦已經繃得很緊的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全然不信，在9月16、18、22日中共中央為此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估計蘇聯有意施放煙幕彈”的意見占了明顯上風，不少領導人還明確認為，柯西金總理的北京之行是為其大舉侵略施放煙幕，如同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國迷惑羅斯福總統一樣。

9月25—27日，中共中央軍委進一步召開軍隊大軍區以上和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人參加的作戰會議，會上強調“全軍當前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加強戰備，準備打仗，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在極度擔心蘇聯貿然發動突然襲擊甚至核打擊的情況下，中央分兩部分疏散，毛澤東主席10月14日去了武漢，林彪副主席16日去了蘇州，周恩來總理則留守北京西山防原子彈的戰備指揮中心。

10月17日，軍委副主席林彪向全軍發佈“第一號命令”，要求“立即疏散重武器，指揮精幹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同時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命令造成了軍隊疏散九十四萬餘人、四千多架飛機、六百餘艘艦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車輛，重要檔案秘密運往西南，全國各大中城市大挖防空工事，全國人民被捲入到這一緊急戰備中。

上述事實證實了中國政府為了應付“迫近”的戰爭危機，已經實施了臨戰前的全面緊急戰備總動員。對毛澤東主席此時採取的這些舉措，後來曾有人認

為“情況估計過於嚴重”，而我則不以為然。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主席舊仇未解又結新怨的兩面出擊戰略下，中國已經是“四面楚歌”了，在中國的整個地緣上已經幾乎找不到可以透氣的縫隙和戰略緩衝帶。毛澤東主席在珍寶島事件後曾憂心忡忡地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毛澤東主席的話既道出了他孤獨的心態，也道出了中國周邊安全的困境。顯然我們還可以試想一下，在中國文革造成的內亂尚未完全結束的情況下，一旦蘇聯在與中國接壤（包括外蒙古）的數千公里邊境線上選擇若干個突破點，以其百萬機械化部隊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這本身已經對中國的戰略防禦構成了難以應對的局面，如果此時中國的“最兇狠的敵人”美國和蔣介石國民黨再從遠東、臺灣海峽、印度支那也趁火打劫，恐怕中國的戰略安全架構將難以承受了。

在嚴重的安全危機壓迫下的中國，高層緊張地探討著各種可能化解危機的對策，也許是基於“民族存亡高於一切”的共識，毛澤東主席和當時中央有關領導竟在“文革”意識形態鼎沸時期，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禁區，把關注點投向了向中國探出橄欖枝的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國。

在美國方面，由於蘇聯在全球戰略上由守轉攻，擺出了咄咄逼人的態勢，令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安全方面遭到很大的壓力；而在亞洲，美國卻又因長期身陷越戰泥潭而大損元氣。以“儘快結束越戰”為競選口號之一獲勝的尼克松總統為了完成戰略收縮、謀求從越戰脫身、確保歐洲戰略重點，考慮到了利用中國與蘇聯的矛盾。1969年7月以後，美國向中國頻發了一連串緩和資訊：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主動宣佈放寬對華貿易和去中國旅行的限制；

26日，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派人轉交了一封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要求訪華，並對中美九年的交惡表示遺憾；

7月底，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出訪期間公開表示繼續孤立中國對亞洲不利；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518頁。

8月8日，美國國務卿在堪培拉公開發表談話，聲稱美國始終努力打開同中國來往的渠道。同時，巴基斯坦等方面也傳來美國有意與中國接觸的資訊。

面對上述資訊和嚴峻的安全環境，雖然毛澤東主席本人及由周恩來總理安排負責調研中國戰略問題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和外交部都想到了三國時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和二戰時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例子，但是，實際上在當時把意識形態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環境下，要打破自己意識形態的桎梏，也絕非易事。首先是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會怎麼看。自1958年中蘇分歧論戰以來，毛澤東主席就開始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甚至不顧國家的外交利益，以反帝反修為口號，始終堅決支援並援助世界上一切敢於同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作鬥爭的各國共產黨左派和激進的革命小組，這個時候如果突然掉頭與“頭號敵人”美國搞緩和，將無法避免地從根本上使其培育、扶持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動搖和混亂，特別是對於當時正處在抗美前線進行殊死戰鬥的越南共產黨和人民來說，也勢必造成混亂和壓力，甚至是信任危機（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後，周恩來總理專程秘訪河內通報有關情況，但仍然不被越方理解）。除此之外，怎麼讓對美國同仇敵愾的中國人民理解中央的良苦用心，以獲得人民的認同。但是形勢比人強，繼“珍寶島事件”以後，蘇聯經過精心策劃準備于1969年8月13日在中國新疆西北部鐵列克提再次發動了消滅中國邊防軍一支巡邏分隊的較大規模軍事行動。面對建國以來從未經歷過的嚴重的戰爭危機壓迫，毛澤東主席終於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拋棄意識形態的顧慮，迅速推動與美國建立緩和的合作關係以牽制蘇聯，達到擺脫戰爭危機的目的。“1969年12月初，中國駐波蘭外交人員受命開始與美國外交官直接接觸。1970年1月8日中美兩國政府正式宣佈華沙大使級會談20日重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頁。

新恢復。在重新開始的會談中，中國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國政府願意在更高級別或通過其他渠道深入商談兩國關係問題”。中國對美國緊閉的大門由此終於漸漸地打開了。

2.2.3 務實者利

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安全危機的緊急關頭毅然放棄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敵視，做出了“聯美抗蘇”的抉擇，這一勇敢務實的重大戰略調整使中國在戰略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一，既消除了來自華盛頓對中國的直接威脅，又使莫斯科不敢對中國輕舉妄動，中國安全環境得以化險為夷，並且中國在地緣戰略中的地位也隨之獲得大大提升。

二，對中國而言，中美兩國關係打破僵局，給國際社會帶來了一個對中國外交十分有利的衝擊。對於那些原來就希望與中國建交又怕得罪美國的國家來說，美國走近中國，就意味著對他們的“解放”，而對於那些原本就不太關心中國，甚至對中國不太友好的國家來說，則是一個有益的觸動。中美靠近的衝擊波實際上引發了中國外交關係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1970至1972年的三年裏，新建交的國家達38個，其中還包括了中國的鄰邦、昔日的宿敵——日本。在短短的幾年裏，中國與西方的所有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徹底打破了美國遏制、封鎖中國的戰略企圖，使中國得以逐漸開始行走於“東”、“西”方之間。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頁。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頁。

2.2.4 小結

在本節裏，我們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出現的重大戰略調整作為觀察研究的客體。由於這次“調整”出現了與中國自身意識形態立場“大反常”的特殊現象，故此，我們的切入點就選擇了從“調整”前中國意識形態與外交戰略的關係開始。

第一步，通過清理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上中美、中蘇這兩條主線，確定了中國外交在毛澤東意識形態主導下發展了兩面出擊的戰略，這一戰略的發展使中國安全環境逐漸惡化。

第二步，通過對出現“調整”的背景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中國安全戰略環境的嚴重惡化是促成調整的關鍵性因素”的結論。

第三步，通過研究分析“調整”與意識形態的矛盾，得出了“調整的障礙即是形成兩面出擊的意識形態本身”的結論。

第四步，通過研究分析毛澤東主席痛下決心進行調整的過程，我們認為，“鐵列提克事件”的發生造成了大戰在即的巨大壓力，促使毛澤東主席痛下決心，拋棄意識形態的桎梏，迅速調整中美關係，以改善安全環境。

第五步，研究清理了中國通過這次外交戰略重大調整所獲得的主要戰略利益。

通過上述五個步驟的研究，我們得出了如下的邏輯關係：

中國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是形成一邊打美、一邊討蘇的“兩面出擊”外交戰略的根源；

“兩面出擊”戰略惡化了中國的安全環境；

改善中國的安全環境必須獲得外部的合作（中國實際上選擇了與美國的合作）；

要想獲得美國的合作就必須放棄“兩面出擊”的戰略；

放棄“兩面出擊”的戰略必須放棄、淡化意識形態中“仇美”、“反美”的成份；

放棄、淡化中國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必然削弱了中國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的外部形象，必然在國內外引起支持者的不解、混亂、甚至恐慌，必然有損中國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威望；

國家安全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爲了前者可以淡化甚至放棄後者，爲了後者不可以違背前者。

從上述邏輯關係中，我們順利地鎖定了務實外交戰略的特徵。中國政府爲了國家的安全利益，以淡化反帝、放棄仇美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來換取獲得與外部世界——美國的合作，以改善中國的安全環境。至於其目的和效果，我們在“2.2.3 務實者利”一節中已經作了說明。由此，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作出的外交戰略上的重大調整是務實外交戰略的典範，它不僅有效地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而且給步入七十年代的中國外部環境帶來了一片生機，毛澤東主席確實在最關鍵的時候下了一步好棋，引用陳毅元帥的一句評語：“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

總結

雖然我們認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內政與外交都基本受意識形態主導的時代，其外交戰略的總體不具備務實外交戰略的特徵，但是發生在建國初的“一邊倒”戰略和1969年的戰略大調整的兩個例外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完全符合“務實外交戰略”的定義，使我們可以判定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戰略具有務實性的一面。

在本章的研究中，我感到觀察到的兩個例外在特徵和邏輯上的驚人相

蘇格著：《論中美俄關係》，刊載於《國際問題研究》2002年第3期，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似，這是我們本章節研究的最大收穫。我希望這些特徵的歸納被大家接受為本章節的結論：

一，其目的都是出於鞏固國家安全或化解國家安全危機的國家安全利益需要；

二，它們都是運用了務實外交戰略獲得了與外部的結盟來滿足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三，它們都具有被迫性和權宜性兩個特徵；

四，意識形態國家十分強調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但是國家安全也是意識形態國家不可逾越的最高原則，因此當國家安全利益需要時，務實外交戰略必然出現。

第三章 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目的和效果

引言

在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革命時代落下帷幕後，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原則上並沒有放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中國意識形態的理論”，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但是，鄧小平先生卻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定當代中國就處在“初級階段”。該理論認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這一把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的極其務實的理論完全順應了中國人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心聲，從根本上否定了毛澤東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論斷，把“以階級鬥爭為綱”這艘已經千瘡百孔並且還在風浪中顛簸的巨輪，拖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安全、繁榮的港灣。這是鄧小平先生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而助其實現這個偉大轉折的是其不遺餘力肯定並倡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以及著名的“貓論”。這些平實無華的哲學觀點改變了中華民族習慣於從傳統經典思想庫尋找解釋現實、指導現實的積習，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先有“理論”後有黨、動輒向馬列主義經典尋找依據的成規，使中國人民可以在沒有更多傳統束縛的條件下，依據客觀現實和客觀條件，並結合中國人民的理想和意志，揚棄附著在中國社會的一切妨礙“進步”的“弊端”，以務實的精神去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2 頁。
同上，第 64 頁。

在上述這一讓鄧小平先生稱爲“第二次革命”的年代裏，中國外交也在鄧小平先生的直接指導下，爲服務於“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總戰略做出了諸多的極富遠見、成效卓著的貢獻。諸如，對中國外交政策做出一系列重大調整和發展；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全方位的外交；“一國兩制”解決香港、澳門問題；20字“經”化解“六四”風波、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對中國政治衝擊的危機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我關心的不僅是鄧小平先生卓著的外交成就，本章的目的是要證明我的第二個假設，即鄧小平時代外交戰略的務實性最爲顯著。我認爲，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明確服務於“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國家戰略，去謀求一個和平、和諧的國際環境，因此就其內政與外交而言，具有本質的一致性與和諧性，並且其外交戰略基本上體現了爲了國家的利益，以淡化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謀求獲得與外部的合作或獲得和諧環境的基本特徵，例如，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論親疏的政策。因此，我在本章安排了對鄧小平先生的“新判斷”外交戰略觀、“一條線”的戰略調整、尊重現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這三個方面來進行證明。由於前兩者處於鄧小平先生外交戰略的核心地位，後者的地位也十分突出，因此，如果在本章我能夠證明這三個方面均具有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我以爲本章的任務就可以完成了。

3.1 鄧小平先生對和平與戰爭的新判斷體現務實的外交戰略觀

3.1.1 鄧小平先生的“新判斷”

六十年代毛澤東主席基於“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必將隨時導致新的衝突而引起世界戰爭”的馬列主義觀點，並結合對國際戰略態勢和中國安全環境壓力的判斷，提出了“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大戰”的觀點。特別是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武裝衝突以後，中國更進入了一個“受戰爭威脅”的臨戰狀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頁。

態。此後，對於戰爭緊迫性的認識就成了毛澤東主席構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出發點和依據。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後，鄧小平先生經過對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的冷靜、客觀地分析，改變了毛澤東時代延續過來的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於 1985 年 6 月做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的新判斷。

3.1.2 鄧小平先生關注和平問題的背景

在中國把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之後，就其內政而言，“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就其外交而言，“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把“穩定”與“和平”連接到一起，就得出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大局所需要的安穩環境。謀求“和平”，從字面上解釋並不複雜，但是，鄧小平先生對於和平的渴望和思考則超乎一般的理解。

略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自五十年代起，毛澤東主席就十分想搞好國家的經濟建設。遺憾的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這種“重視”一直沒能真正付諸實施。其原因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干擾外，中國自建國後多數時間裏都處在戰爭和戰爭威脅下，面對安全環境的挑戰，中國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資源和精力用於對抗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長此以往，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佈局和經濟的發展自然倍受影響和制約。例如，龐大的一、二、三線建設佈局，雖美其名曰“建設佈局”，但就其“佈局”的出發點而言，是“準備打仗”，而絕非經濟建設，再者就是每年高居不下的軍費開支。這些令中國政府銘心刻骨的經歷，使鄧小平先生得出了“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7 頁。

同上，第 284 頁。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 頁。

的體會。此外，鑒於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底子薄，實現中華民族求富求強的雄心壯志是一個長期過程，鄧小平先生設計了一個“三步走”的現代化七十年發展戰略規劃。鄧小平先生說：“一打仗，這個計劃就吹了，只好拖延。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是一個階段，再加 30 年至 50 年，就是說我們希望至少有 50 年到 70 年的和平時期。”從本段落裏，我們有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建設本身要求中國能獲得一個可以專心搞建設的長期的和平安定環境，但是，獲得這個條件的主動權並不完全在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國際安全環境是否存在中國獲得這一條件的基礎。

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必備的前提，它可以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但是，“沒有投入便沒有產出”的規律使得在二十年階級鬥爭中已把國庫折騰空的中國在資本投入上感到了捉襟見肘的困擾。鄧小平先生感慨地說：“中國太窮，要發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環境裏才有可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鄧小平先生把目光投向了軍費開支。1980 年 3 月 12 日，鄧小平先生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腫’不行，還有我們國家現在支付的軍費相當大，這不利於國家建設。”“如果能夠節省出一點用到經濟建設上就更好了。冷靜地判斷國際形勢，多爭取一點時間不打仗還是可能的。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應當盡可能地減少軍費開支來加強國家建設”。從鄧小平先生這些論述中的字裏行間，我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和平的渴望，但是實際上，中國軍費能否削減，甚至實行大裁軍，在相當程度上不取決於中國的主觀意志，而是取決於國家的安全環境。

長期戰火和“左”的雙重摧殘以及西方對華長期的遏制性封鎖，使新中國一直處在與外界半隔絕的孤立狀態，加上新中國對於國際事務中一些“技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7 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2 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5 頁。

巧”的掌握尚欠精通，因此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國與國際上的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拉開了很大的距離。鄧小平先生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加強國際合作，但是良好的國際合作如果缺少和平的環境以及和諧的外部環境也是不可能的。由此給中國的外交戰略更直接地提出一個富有挑戰的課題：毛澤東時代延續過來的外交戰略，特別是關於安全戰略方面的政策是否完全符合當今現代化建設和開放的要求。然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同樣又取決於國家的安全環境。

從上述三個層面的分析中，我們觀察到了鄧小平先生戰略方面的困擾，三個方面的問題集中到一點，都要求鄧小平先生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做出一個符合客觀的判斷。如果這個判斷不能做出，實際上將從根本上影響到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外交戰略的制定，或令戰略模糊不清。一旦出現這個情況，勢必影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體戰略。因此，鄧小平先生把目光緊緊盯住了國際戰略意義上的戰爭與和平問題。

3.1.3 向客觀求答案

根據史料和有關專論的介紹，鄧小平先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開始關注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此後，雖然鄧小平先生經常對爭取和平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見解，並且不斷調整看法，但一直不敢輕率地做出具有結論性的判斷。鄧小平先生對戰爭與和平的新判斷是一個探索和認識的過程，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這個時期的主要觀點，一是認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 頁。

為戰爭不可避免，強調了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增長，對於中國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是有利的也是可能的。

1980年1月，鄧小平先生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有信心，如果霸權主義鬥爭搞得不好，可以延緩戰爭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這是可能的。”

1980年3月，鄧小平先生在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冷靜地判斷國際形勢，多爭取一點時間不打仗還是可能的。”

1980年4月，鄧小平先生說：“採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險可以渡過，不是不能渡過的，我們說爭取20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

1982年，鄧小平先生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說：“我們不是悲觀主義者，我們說戰爭的因素在增長，但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增長。”

第二階段是由八十年代中期起，這個時期的主要觀點是，雖然戰爭的危險始終存在，但實際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大，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先生說：“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夠安心地搞建設？”

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先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論述了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轉變過程，為新的判斷做了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並論述了客觀的判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頁。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頁。

斷依據。

依據鄧小平先生的論述，我理解並整理成如下四點：

1. 當今世界上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打世界大戰，雖然雙方都具有能夠摧毀對方多次的十分強大的核力量，但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摧毀對方後尚能保存自己的能力，因此，雙方實際上都懼怕核戰爭，都小心翼翼地維持著恐怖的和平；
2. 美、蘇兩家都在努力進行全球性的戰略部署，但由於各種因素的牽制，困難重重，致使兩方全球性的部署都沒有完成，它們在世界各地的爭奪一直相持不下，但誰也沒占什麼便宜。如，美國在朝鮮、印度支那的戰爭，蘇聯侵略阿富汗和支援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戰爭，其結果都使雙方元氣大傷，因此，兩方在受“教育”後均不敢貿然輕啓戰端；
3.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首先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是維護和平的主要力量，其次，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中發達國家雖與美、蘇有戰略聯盟關係，但都不希望戰爭，甚至美、蘇兩國人民也不支援戰爭；
4. 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日益突出，對於這種形勢，無論美國、蘇聯還是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能不認真對待。

3.1.4 “新判斷”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大局的意義

“新判斷”為中國對當今時代特徵的認識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沒有“新判斷”，中國對時代的認識就不可能實現由革命與戰爭年代向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轉變。

“新判斷”為中國政府拋棄了戰爭隨時可能發生的沈重包袱，為中國專心致志地搞建設提供具有根本意義的依據。

“新判斷”為中國政府削減軍費、實現百萬大裁軍提供了決定性的依據。

“新判斷”為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據。

3.1.5 小結

我相信，當人們讀完 3.1.1 小節至 3.1.4 小節以後會發現“新判斷”並不是外交戰略，但是人們將必須承認這個由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新判斷”確實是中國政府在新時期對內政、外交、安全方面進行重大戰略決策不可或缺的依據，它不是外交戰略卻屬於外交戰略的範疇。在本節的研究中，我們不得不由衷地讚歎鄧小平先生的“由實踐中發現矛盾 從中找出主要矛盾 從實際出發向客觀尋求答案 改變固有觀念 指導實踐”這套極其尊重客觀的思想方法，它貫穿了鄧小平先生從發現問題到回答問題的始終。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獲得了本節如下的結論。

通過本節的研究，我們完全證實了鄧小平先生對和平與戰爭問題作出的“新判斷”的思想是源于對客觀現實進行長期觀察、研究得出的結果。其可貴之處就在於“務實”，就在於未受意識形態的左右，“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在於鄧小平先生勇於從客觀世界獲得智慧和力量，以新的、科學的判斷取代了毛澤東主席已經不合時宜的、傳統的和平與戰爭觀，為中國的外交戰略乃至國家總體戰略的制定和決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據。因此，我認為，鄧小平先生對和平與戰爭的“新判斷”體現了其務實的外交戰略觀。

3.2 “一條線”戰略的調整是務實外交戰略的典範

3.2.1 “一條線”戰略的形成和發展

新中國建國前，毛澤東主席出於新政權自身的需要和意識形態的緣故，務實地選擇了靠向蘇聯的“一邊倒”外交戰略。後中蘇兩黨因意識形態分歧發展到兩國間的對立，終於在 1969 年釀成了兩國在邊境上的一系列武裝衝突，使中國陷入了美、蘇兩國戰略包圍的安全危機之中，毛澤東主席曾把這種形勢比喻做“夾肉麵包”。當毛澤東主席意識到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威脅時，斷然放棄了意識形態的顧慮，採取了純戰略動機的極務實的外交戰略調整，與中國的仇敵——美國緩和了關係，並逐漸形成了反對共同敵人——蘇聯的戰略同盟。1973 年 2 月這個同盟得到了進一步擴展，毛澤東主席在與基辛格博士談話時提出：“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由此，毛澤東主席明確倡導了“一條線”戰略以共同對付蘇聯。

這一戰略的實施在毛澤東主席去世後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重視和發展。1978 年華國鋒主席在全國人大會上說：“全世界人民反對蘇美兩霸，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鬥爭空前高漲，一個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軍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正在廣泛開展，這是國際形勢大好的一個突出標誌”。在這次大會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部正式憲法中，正式寫入了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內容。1979 年 1 月，鄧小平先生在訪美期間答記者問時說：“你通過談判或協定約束不了蘇聯霸權主義”、“需要的是採取更現實的、更切實可行的步驟，比如說，美國、中國、日本、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這些國家聯合起來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 頁。

孫其明著：《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26 頁。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頁。

對付蘇聯霸權主義。”

從 1969 年中國發生安全環境危機、毛澤東主席啓動“一條線”戰略到 1979 年的十年間，“一條線”的形成與發展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和打開西方之門創造了極好的條件，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毛澤東主席之後，鄧小平先生仍將其視爲是構建中國戰略安全的主體框架，予以高度的重視。這個結論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鄧小平先生 1979 年在美國那一番企圖強化“一條線”戰略的談話。

3.2.2 調整“一條線”戰略的背景分析

一，如果我們客觀地分析一下中國兩次結盟，我們會發現，不論中國是選擇“一邊倒”與蘇聯結盟，還是後來選擇“一條線”與美國結盟，實際上都沒有跳出二戰後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東西兩大集團對抗的基本格局。只要這個格局尚存一天，不論中國與美國還是蘇聯結盟，都勢必損害、犧牲中國與對立面同盟國或友好國的關係。如果我們把“結盟”的這一負效應與中國全面開放、力圖與全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大戰略格局放到一起，很顯然，中美結盟的結構必然有礙大局的形成，並且這一同盟關係有悖於中國倡導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更直接違背了“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的政策。

二，“一條線”戰略的實施曾經使中國獲得極大的安全利益，這是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形成“一條線”戰略的根源畢竟是以中國自身嚴重的安全危機和美國“收縮”戰略爲背景的，因此，就其本質而言是共同需要的結果，並且具有權宜的特徵。1979 年 4 月 10 日，美國卡特總統簽署了《與臺灣關係法》，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頁。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 頁。

才開始引起了中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不健康性的警覺。特別是雷根政府上臺前後，美國改變了原先對中國戰略地位的估計，並導致了政策調整，使雷根政府做出了提高對臺灣軍售的主張。美國政府這一做法才徹底觸動了中國政府的敏感神經。1981年1月，鄧小平先生借會見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和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之際，向美國發出了明確的資訊，提醒美國不要以為“中國是無足輕重的，是一個不值得重視的國家”、“以為中國有求於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並且十分嚴正地警告美國“要明確一點，即在臺灣問題上如果需要中美關係倒退的話，中國只能面對現實，不會像美國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出於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臺灣問題吞下去，這不可能”。在這裏，我十分同意中國外交學界稱“美國在對台軍售上給中國上了一課”的看法，實際上美國的所作所為再一次提醒了鄧小平先生，中美戰略同盟的關係是十分脆弱的，如果中國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構建國際安全環境主要就寄託於這一以中美戰略同盟為核心的“一條線”戰略，其結果將是被動的、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險的。要是“天能不下雨”，中美還有必要擠在一起“避雨”嗎？冷靜、務實的戰略家鄧小平先生把目光投向了中蘇的關係，投向了對國際安全態勢的觀察。

三，中蘇兩國關係自爆發珍寶島邊境武裝衝突以後，兩方關係就一直處在軍事對峙、筆墨互攻的狀態下。1976年1月至9月間，中國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去世，蘇聯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發出了很多希望緩和的資訊，力圖改善中蘇關係。但是，中國一直堅持毛澤東主席“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完全沒有理會蘇聯的呼籲，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政府在戰略上仍然高度依賴“一條線”。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意識形態弱化的趨勢使中蘇衝突的根源——意識形態的分歧，一下子似乎顯得完全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頁。

無舉足輕重，給中蘇改善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但真正令中蘇兩國都積極互動起來的是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它促使鄧小平先生重新客觀地審視中美、中蘇關係以及重新評估“一條線”戰略。“大約從 1981 年下半年起，中國開始採取主動，包括提議恢復中蘇邊境問題的談判等，向蘇聯發出了改善兩國關係的資訊”。中國外交上的調整以及中美之間出現的糾紛，對於迫切希望改善蘇中關係的蘇聯來講當然是一個好消息，莫斯科對北京發出的資訊很快做出回應，隨後兩國間你來我往、逐步升溫，“冰雪”開始融化了。這個重大變化預示著中蘇兩國軍事對峙時代即將結束，蘇聯已不再是中國國家安全最危險的敵人了。

四，鄧小平先生從 1980 年 1 月、3 月、4 月連續三次在不同的場合談論避免戰爭的問題，其中四月份鄧小平先生說：“爭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險可以渡過，不是不能渡過的，我們說爭取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從鄧小平先生在如此短的幾個月中連連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斷發表見解，一方面說明他對於和平的關注，另一方面更可能是緊迫感，那就是為戰略調整尋找依據。

上述有關戰略調整的背景可以歸納為：“一條線”戰略總體上已脫離中國新時代的需要；中國政府對“一條線”戰略的覺醒；中蘇關係的冰雪消融是徹底調整“一條線”戰略的必要前提；鄧小平先生對和平的判斷是“一條線”戰略調整的基礎。上述這四點，概括了鄧小平先生進行戰略調整的基礎要素。

3.2.3 戰略調整過程是鄧小平外交戰略成形的過程

由於“一條線”戰略是 1969 年底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構建的中國國家安全

孫其明著：《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4 頁。

的主體框架，經過十年的發展完善，這一戰略從意識形態、相關政策到外交關係，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在 1978 年還正式寫入了新中國第三部憲法中。因此，對“一條線”戰略進行調整絕非易事。鄧小平先生的調整工作不是從理論上著手，而是採取了一個迂回的戰術，以就事論事、逢山開路、一步一步調整的漸進方法來穩步進行，在調整開始數年之後才於 1985 年 6 月對調整“一條線”戰略進行理論性的總結說明。調整的整個過程是從 1981 年底開始，歷經八年，於 1989 年完成的，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一，拉開了與美國的距離。謀求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在中美之間形成一個主權國家之間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國家關係，並明示結束以往實際戰略同盟的關係，對美國在臺灣軍售等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上的霸權主義行徑、以及損害中國利益的政策進行鬥爭和說服。這些做法不僅沒有惡化中美關係，反而使美國更重視中國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實行“一條線”戰略時期中國外交受到制約的情況，使中國的外交戰略由被動轉向主動。

二，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化敵為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謀求與蘇聯建立睦鄰友好的國家關係。但中國拒絕重返“社會主義大家庭”，在改善中蘇關係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三大障礙不消除，中蘇關係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的反霸權的立場。

三，調整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在調整對美、對蘇關係的同時，對於美國和蘇聯的同盟國或友好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根據國情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方針，力圖以“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的政策為先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與全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友好、有益的關係，特別是促進雙方的貿易和經濟合作往來。

從 1981 年至 1989 年，中國經過八年的外交戰略調整，鄧小平時代的外

交戰略也在調整中逐步成形，總體歸納如下：

向全世界宣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全面開放改革，謀求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經濟組織建立有利於中國、有利於合作方的經貿合作關係，促進共同的發展；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謀求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謀求世界的和平。

3.2.4 小結

本節裏我研究的客體是“一條線”戰略的調整。在進入對調整行爲的研究之前，我們實在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一條線”戰略、它形成的背景，以及這一戰略由毛澤東時代延續到鄧小平時代以後、在鄧小平先生對其進行調整之前的地位。在 3.2.1 小節裏，我們清楚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清理完這個基礎以後，我們在 3.2.2 裏進入了對圍繞與戰略調整密切相關的要素進行深入討論，這四個要素分別是：背景；動因；前提；條件。我之所以把握這四個層面，因為我觀察到了這樣的邏輯：“一條線”戰略違背中國外交戰略謀求一個和平環境的基本出發點，因此調整是必然的；美國輕視中國的戰略地位並損害中美戰略同盟關係，使中國明確認識到中美戰略同盟對中國戰略大局的損害，不利於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由此進一步肯定了調整“一條線”戰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鄧小平先生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樂觀判斷直接挑戰了“一條線”旨在維護中國安全戰略利益而存在的合理性，這一判斷成了戰略調整的重要基礎；“一條線”戰略的存在是以對抗蘇聯的安全壓力為前提的，當中國政府開始主動調整與蘇聯的關係，中蘇關係迅速升溫時，“一條線”戰略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中蘇關係的緩和是中國政

府對“一條線”戰略進行調整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上述四點概括了戰略調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不破不立，破就是立，立在其中”，我們利用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話揭示了“一條線”戰略的調整和鄧小平外交戰略形成之間的關係。“一條線”戰略的調整共分三部分：拉開與美國的距離，向世界突出宣示了中國不結盟、反霸權、維護世界和平的政策立場；與蘇聯化敵為友，向世界突出宣示了中國追求和平、反霸權、不以意識形態影響國家關係的政策立場；調整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論親疏的政策立場。鄧小平的務實外交戰略就在這八年中的“破”與“立”的過程中逐步形成。

當我們完全理解了中國政府“一條線”戰略調整的過程和本質以後，我們也不難得出本節研究的結論。

通過本節的研究，我們完全認識到了構建一個和平、和諧、利於中國進行廣泛國際合作的外部環境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但是，這種利益的獲取必須是通過國際間的合作來實現的。因此，最廣泛地與世界各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就成了實現這一利益的關鍵所在。當中國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呈現阻礙這一利益實現的端倪，鄧小平先生完全沒有受“一條線”戰略已經形成的意識形態、法律地位和既定政策的制約，以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選擇了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決策原則，對不利於謀求建立和平、和諧外部環境的“一條線”戰略進行了重大的調整。鄧小平先生進行的這一工程浩大的調整充分地體現了為了國家的利益，以淡化、削弱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換取獲得與外部世界的合作或者和諧的這一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因此，我們做出了“一條線”外交戰略的調整是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體現的結論。

3.3 尊重現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鄧小平務實外交戰略的體現

3.3.1 全面改革開放下追求大一統的隱憂

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實現現代化的經濟建設目標以後，中國的外交戰略為全面改革開放謀求一個和平、和諧的國際環境，以利於中國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經濟組織建立有利於中國、有利於合作方的經貿合作關係，促進共同發展的任務。毋庸諱言，中國開展國際經貿工作的重點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包括亞洲地區的較發達國家和地區大量吸引資金，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當鄧小平先生在中共十二大上把“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提高到作為中共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的關注，同時也引起海外一些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人士的擔憂。我將這種“關注”和“擔憂”的根源做了如下重點清理。

一，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都是中國領土，在這一點上，國際社會沒有爭議，但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對上述地區行使主權。

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都具有很強的西方背景，或稱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背景。香港和澳門甚至由殖民地宗主國英國和葡萄牙直接掌控管理，臺灣的背後則是與“中華民國”有同盟關係甚至在現實中充當著某些“監護”角色的美國。上述三個國家在這三個地區已經均有較穩定的既得經濟利益，特別是美國在臺灣還具有較重要的戰略利益，因此就這三個國家的主觀願望，誰都不希望現狀的改變，即便是中國對上述三個地區行使主權不可避免，也千方百計要維護其現存的既得利益。例如，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對臺灣的軍售，配合“反對向臺灣使用武力”和“不主張臺灣獨立”的兩面手法，力圖維持不統、不獨局面，而臺灣國民黨當局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頁。

來對抗中國大陸對統一的召喚。英國方面同樣也曾做過不改變現狀的力爭，首先是“拋出三個條約繼續有效論，企圖使其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永久化、合法化”，對此，鄧小平先生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明確回應說：“如果中國在 1997 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後來英國方面又提出“以主權換治權”，要求中國政府“同意英國 1997 年後繼續管理香港”。在中英會談期間，爲了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港英當局不斷在香港製造輿論，“兩種制度不能融合”、“香港的繁榮離不開英國管理”、“港人治港行不通”等等。柴契爾首相甚至斷言，中國如宣佈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英國方面是企圖提醒中國政府，香港沒有英國不行，如果香港出問題，對中國現代化不利，以此來說服中國政府按英國人的意見辦。

三，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且這三個地區經濟上都十分發達。特別是香港和臺灣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經濟獲得高速發展，被譽爲“亞洲四小龍”。人民已經安居樂業，都具有求穩怕“變”的心態，香港地區表現尤爲突出。在中國政府明確表示 1997 年將收回香港主權以後，雖然香港經濟仍然持續高速發展，但港人卻普遍陷於對“回歸”的擔憂之中。例如，香港 1982、83 兩年出現的以嘉寧和其他數家資產百億以上的地產集團破產爲標誌的地產大滑坡，其原因雖有一定經濟發展周期的影響，但港人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則是一個較根本的原因；再者，與此同時香港出現的“匯率”危機也說明了同樣的原因。此外，港人多次組團赴倫敦和北京請願，以及香港出現的移民潮，也都說明了港人的信任危機。

從上述“三點”的清理中，我們得出具有一定共性的三點結論： 香

港、澳門、臺灣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 香港、澳門、臺灣的當局，特別是港英和臺灣國民黨當局，都全力避免角色的變化； 三個地區的人民都對統一缺乏熱情，甚至有所擔憂。如果我們把這三點結論放到中國謀求在經濟發展中獲得國際（西方）和周邊的廣泛合作的戰略意圖的大局下來觀察的話，本小節提出的“全面改革開放下追求大一統的隱憂”也就十分清楚了。我們可以試想，在中國政府堅定地表明主權的意志面前，如果一旦這三個國家和這三個地區都採取不合作甚至拒絕的做法，且不要說中國對這三個地區行使主權將舉步維艱，恐怕這三個地區自身政治經濟的穩定都將出現極負面的情況。如果真出現這一局面，那可就是開放之憂、統一之患了。

3.3.2 “一國兩制”的概括力

本小節將討論的問題是“一國兩制”的合理性，我準備以香港問題為研究客體。在討論展開前，我們首先希望確定一個前提，即中國政府對香港地區行使主權的不可爭議性。當我們承認這個前提以後，餘下的問題就相應簡單了。

在解決香港問題上，從合理的角度看，如果大家都希望各自在香港的利益得到保障，大家在解決問題的模式上的認同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在這一前提下，不論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還是香港居民，大家所考慮的模式都必須是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才具備可行性，如鄧小平先生所說：“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接受。”對於各方利益，我做了這樣的分析、歸納：

中國要求英國保證在 1997 年與中國政府合作順利進行主權移交，在過渡期內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 英國方面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在港利益不受損； 香港居民要求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一切不變。根據這三個方面的要求，我們可以從邏輯上得出三個三方基本一致性的因素： 香港 1997 年移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頁。

交主權；中國、英國、港人的利益都需要保持繁榮；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能改變。鄧小平先生在會見柴契爾夫人時的開頭語對我們的這個推論作了最好的支援：“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 1997 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 1997 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依據上述對各方利益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採用邏輯推理來得出如下回歸模式：香港主權必須回歸到世界只有的一個中國，中國現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為了保證各方的利益，香港必須繁榮穩定，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能改變。由此，在同一個國家裏出現了兩種制度，當然只能稱為“一國兩制”。

在結束本小節的討論時，我沒有忘記在 3.3.1 小節中曾專門討論了中國追求大一統的隱憂。實際上，這個隱憂在八十年代的一段時期裏一直令人擔心，所幸的是，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以其無比的概括力充分把握住了有關各方的利益，使大家在利益共同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既圓滿地完成了香港主權的回歸，又完全化解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大隱憂。

3.3.3 “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徵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在其行使主權的領土內實行的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從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在其行使主權的領土內實行的是兩種制度，由此也必然是兩種意識形態在同一個主權下並存。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頁。

國家制度由一元性轉變為二元性，後者必然是對前者的弱化。國家意識形態由一元性轉變為二元性，後者亦必然是對前者的弱化。因此我認為，“一國兩制”具有對中國國家主權和意識形態弱化的特徵。

3.3.4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務實的智慧

中國是個疆界遼闊、國境線相當長的國家，在沒有明確的國家、主權概念之前，中國的疆土往往隨朝代不同而發生變遷，因此並不嚴格。到了近代，在國家、主權的意識逐漸清晰以後，在中國的邊境線上，由於民族、地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護疆不力等等原因，造成了中國與大多數鄰國之間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雙方對邊境線劃分看法不同的問題。新中國建國以後，圍繞中印邊界、中蘇邊界、中越邊界和中國的南沙、西沙、釣魚島等，除了釣魚島外，均發生了武裝衝突，給雙方都造成了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應該如何合理解決邊界的糾紛，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個困擾。特別是在國界線的劃分上，由於雙方提供的證據、法理的依據以及立場、角度的不同，加上歷史已經十分之久遠，平心而論，有時很難道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領土問題又是個體現國家主權的極敏感的問題，搞不好就是喪權辱國，因此國家之間在涉及領土劃界的糾紛上很難在有爭議的情況下作出讓步，當事國往往在毫無結果的馬拉松爭吵中做無意義的消耗。鄧小平先生以其務實的智慧創造性地為解決領土糾紛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想。在談到與日本有爭議的釣魚島問題時，鄧小平先生“建議把主權爭議放一下，共同開發，共同得利”；關於南沙群島問題，鄧小平先生也提出“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鄧小平先生這一思想的智慧光芒就在於，他看透了在領土爭議上，說服與被說服都是十分困難的，與其兩方糾纏不休，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1 頁。

還不如大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共同得利”。這思想之妙就在於對主權的弱化上，把主權爭議擱置起來，雙方不再強調主權問題，在這種主權的弱化中，雙方把矛盾進行合理轉移，使大家獲益於其中，並通過這種獲益，反過來維護了各自的主權利益。

3.3.5 小結

本節所研究的課題主要是針對與主權有關的“歷史遺留”問題，雖然解決此類問題不是中國外交戰略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如果處理不好，則足以困擾大局，因此我將解決此類問題視為是為大局“除憂”，是中國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

在 3.3.1 小節中，我們的任務是清理背景，通過清理確定了兩點：中共十二大把實現祖國統一作為中國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的提法是在中國非常需要謀求外部的和平、和諧及合作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香港、澳門、臺灣這三個地區具有共同的特性，這些共性反映出了中國謀求統一的負面基礎，從而揭示了中國政府追求“大一統”的隱憂。

在 3.3.2 小節中，我們所要觀察的是“一國兩制”模式是否概括了各方利益。我們首先把“主權不可爭議”作為討論的前提，這個前提很重要，它把各方利益的體現集中限制在經濟方面，這樣邏輯就清晰了，後面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 3.3.3 小節中，我提出了一個以前我所閱讀的專著中所沒有發現過的觀點。我認為，中國主權和意識形態的弱化是“一國兩制”的兩個特徵，當然這個特徵不是唯一的，由此，我們揭示了鄧小平先生務實外交戰略中帶有本質性的特徵。

在 3.3.4 小節中，我們觀察到了鄧小平先生在處理香港、澳門、臺灣這

三個地區的統一問題和在考慮對釣魚島、南沙群島問題具有共同的一種邏輯形式。例如，在主權的爭議點上都具有“弱化”的特徵。香港問題是通過“一國兩制”的兩制對主權弱化的方式來達到化解矛盾、求得共識；釣魚島、南沙群島問題是通過“擱置爭議”的弱化主權方式來達到化解矛盾、求得共識。並且安排在雙方放棄爭議的利益回報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前者是以“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來保障各方的利益，後者是通過“共同開發、共同得利”來使雙方獲得利益。依據上述內容的邏輯，我演化出了如下十二字：“謀求合作、弱化主權、共同獲利”。

在結束本節之前，可做如下歸納：鄧小平先生爲了謀求中國取得國際社會的合作，爲了謀求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和諧，爲了謀求中國的統一，以對中國主權和意識形態秋毫無損的“弱化”，換取了中華民族的巨大利益，這一戰略完全體現了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並且由此向國際社會再次展示出了中華民族“求同存異”的智慧和“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一平凡而又深刻的哲理。

總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中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謀求一個和平、和諧的國際環境就必然成爲中國外交戰略的目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延續過來的外交戰略觀和外交戰略實際上並不符合新時代的需要。鄧小平先生通過如下三個關鍵性環節實現了外交戰略的重大變遷和新戰略的形成。

“新判斷”揭示了鄧小平時代謀求和平的本質，爲實現對“一條線”戰略的調整提供了帶有根本性的依據。

“一條線”的戰略調整使鄧小平時代中國外交戰略完全符合了謀求一個和平、和諧國際環境的國家總體戰略的需要。

以“一國兩制”和“擱置爭議”解決歷史問題則完全是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體現。

在對上述三個體現鄧小平先生外交戰略的關鍵性環節的研究中，我已經完全證實了其具有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並由此使我在本章裏完成了對“鄧小平時代外交戰略的務實性最爲顯著”這個假設的證明。並且歷史也已經完全驗證了鄧小平時代謀求一個和平、和諧國際環境的務實外交戰略獲得了顯著效果，它確實爲中國開展全方位的外交、促進經濟上的全方位國際合作、促進中國經貿持續二十多年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任何的合作與和諧都不可能是單方面努力的結果，由於中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此，在國際上爲了謀求外部最大化的合作與和諧，就必然在外交戰略上以淡化、削弱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來換取，這種務實的外交戰略所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的本質需要。因此，我認爲鄧小平時代的整個外交戰略是務實外交戰略的典範。

通過對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的研究，我們也同樣發現了鄧小平務實外交戰略在圍繞戰略觀、戰略原則甚至危機對應都呈現出了十分一致的特徵。令人倍感興趣的是，這些特徵與本論文第二章提出的毛澤東時代兩次例外的務實外交戰略的特徵都有完全相悖的現象，這也應該是本章的重要收穫。以下請允許我以對這些特徵的歸納作爲本章的結論。

一，目的都是爲了最大化地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謀求一個和平、和諧的國際環境。

二，體現了國家利益與務實外交戰略本質上的一致性與和諧性。

三，由於務實外交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主導的結果，因此具有廣泛性和主動性兩個特徵。

四，反霸權、反強權是通過對反和平、反獨立的霸權和強權的鬥爭，以

達到世界和平與中國自身安全的目的，基本特徵是道義上進攻的主動性和戰略防禦上的被動性。

五，國家安全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也是鄧小平時代不可逾越的最高原則，當國家安全危機、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侵犯以及政權鞏固發生危機時，在外交斡旋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例外”，這種例外可以導致中國以非和平的對抗方式，甚至是武力的方式消除上述危機，但當危機過後，外交戰略將恢復常態。

第四章 內容總結及主要論點

4.1 論文內容總結

本論文研究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務實外交戰略問題。由於我運用了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一理論，因此，我把中國的內政作為一個背景或者基礎貫穿了論文研究的整個過程。雖然中國建國以來的內政、外交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內政和外交戰略卻發生了一個內政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外交戰略上由反對帝國主義、支援世界革命到謀求一個和平、和諧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因此，我們把研究分為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個歷史階段。

在對毛澤東時代的研究中，我發現在這個時期的務實外交戰略僅是作為一個例外而存在，並且是被迫於為了鞏固政權生存、規避安全危機的國家核心利益而採取的戰略，因此在這一章裏，我把較多的研究精力放在毛澤東主席在面對十分複雜的內外環境時如何進行外交戰略抉擇方面。而在鄧小平時代，我發現在整個時期的外交戰略觀到外交戰略都呈現了務實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徵，而且發現鄧小平先生的務實外交戰略與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戰略具體高度的一致性與和諧性，因此在這一章裏，我把較多的研究精力放在了對中國總戰略與外交戰略關係和對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外交戰略變遷過程的研究。從“破”和“立”當中觀賞到了兩代偉人的精彩對話。

在研究過程中，我比較注意在每個事例的研究，從大背景入手，挖掘其中的動機和目的，並且從對其效果的分析中進一步反證了我對動機和目的的判斷。但本論文並沒有簡單地把研究停留在目的和效果上，我把研究進一步推到了更深的層面，即挖掘、整理務實外交戰略的規律性問題，並最後獲得了對中國務實外交戰略的兩個重要的論點，較大地豐富了論文研究的成果。

在本論文內容總結裏，我希望說明如下三點：

一，江澤民總書記主政以來，在外交上有過許多務實外交戰略的佳作，例如，堅持鄧小平先生“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思想，運用鄧小平先生“冷靜觀察、沈著對應、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危機對應的 20 字精神，使中國在“‘六四’和‘東歐、蘇聯劇變’”、“南聯盟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三次中美關係低潮中，在較短的時間裏得以調整和恢復，使中國現代化建設得益于國際和平環境的保障等。但由於其基本外交戰略是繼承了鄧小平先生務實外交戰略原則和戰略框架，因此我沒有把江澤民主政時期在外交上再重新劃分一個時代。

二，在鄧小平時代的研究裏，由於受限於篇幅，我僅選擇了三個我認為是最能體現務實外交戰略的比較重要的例子。因此，不能由此誤以為鄧小平時代僅有這三個例子可以說明他的務實外交戰略。

三，本論文題目由於受到篇幅的影響，沒有進一步從中華文化的古典哲學中去尋找根源，這是我感到的一個遺憾。

4.2 論文的主要論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不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時代，中國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理論的意識形態國家。本論文的研究結果清楚地告訴我們，意識形態不是任何時候都左右了中國的外交戰略的。從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登峰造極的時代到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相對淡化的時代，我們觀察到了這種變化的規律，利用這些規律，我整理成如下論點：

一，當意識形態主導了中國的內政、外交時，通常不會出現務實的外交戰略。但是當國家陷於政權的生存、鞏固和安全的危機時，出於國家核心利益

需要，才會出現例外。這種例外的務實外交戰略由於有悖於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觀意志，因此具有被迫和權宜的特徵。

二，當國家總體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經濟，意識形態相對淡化時，務實外交戰略就大行其道。由於它與國家總體戰略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與和諧性，使得務實外交戰略在實行過程中具有廣泛性和主動性。當出現國家安全危機、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侵犯以及政權鞏固發生危機時，為了國家的核心利益，中國就可能出現例外，這種例外可能導致國家行使武力解決危機。當危機過後，務實外交戰略將恢復常態。

三，無論是意識形態主導著中國的內政、外交，甚至大搞革命輸出的毛澤東時代，還是迫於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壓力而大搞經濟建設的鄧小平時代，不論這兩個時代的內政、外交有多麼的不同，就其所實行的務實外交戰略的本質而言，卻都是一致的，即，中國本國的國家利益仍然是指導中國外交戰略的最高原則。換言之，務實的本質無外於實在主義。當然，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實行務實外交戰略是有不同的，前者僅是外交戰略中的例外，後者則是常規，而非例外。

在結束本論文之前，我仍然深深地沈浸在對毛澤東主席和鄧小平先生兩位中國當代最偉大戰略家的讚歎之中。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們：不論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在鄧小平時代，務實外交戰略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前者實行的務實外交戰略為中國鞏固新生政權和化解國家安全危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效果極其卓著。後者實行的務實外交戰略已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環境，使中國的經濟得以維持了二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它使中國的崛起成為現實，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現了曙光。

參考書目

1.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 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
3. 裴默農著，《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4. 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9 年版。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
6.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7.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年版。
8. 王立勝等著，《鄧小平理論在實踐中的堅持、運用和發展》，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
9. 靳輝明主編，《社會主義歷史、理論與實踐》，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0. 王惠岩主編，《政治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1. 羅正楷主編，《中國革命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12. 高鳴主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13. 李鳳梧主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論》，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4. 浦興祖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15. 江丹林等主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6. 佟寶昌等著，《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回顧與思考》，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17. 孫津著，《新中國外交啓示錄》，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8. 項啓源著，《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地位》，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1 年版。
19. 陳宏總撰稿，《新中國外交》，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99 年版。

20. 王俊彥著，《開國外交》，時事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楊福昌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版。
22. 王泰平主編，《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23. 田曾佩主編，《開放改革以來的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3 年版。
24. 曲星著，《中國外交五十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5.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26. 江流主編，《輝煌的五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
27. 陳明顯編著，《新中國五十年》，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28. 劉傳增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寫真》，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
29. 韓泰華主編，《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五大》，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30. 吳冷西著，《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
31. 蘇格著，《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版。
32. 宮力著，《毛澤東與美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9 年版。
33. 孫其明著，《中蘇關係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34.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5. 宮達非主編，《蘇聯劇變新探》，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版。
36. 左鳳榮著，《致命的錯誤》，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1 年版。
37. 楊潔勉著，《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分析與探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38. 林利民著，《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時事出版社 2000 年版。
39. 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40. 陳潔華著，《二十一世紀中國外交戰略》，時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41. 張毓詩編著，《世紀之交的國際關係》，時事出版社 2002 年版。
42. 朱明權主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43. 劉從德著,《和平共處理論與現實格局的形成》,武漢出版社 2001 年版。
44. 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45. 王立勝等著,《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6. 張虎著,《港澳“基本法”釋論》,桂冠圖書公司 1996 年版。
47. 何方著,《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版。
48. 劉戰主編,《實踐“三個代表”,鞏固執政地位》,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1 年版。
49. [美國] 亨利·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DIPLOMACY),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50. [美國] 吉姆·赫爾姆斯 (Kim R. Holmes) 詹姆斯·普裏斯特 (James J. Przystup) 主編,張林宏、周丕啓、王易譯,《外交與威懾:美國對華戰略》(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新華出版社 1998 年版。
51. [美國] 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羅絲·芒羅 (Ross H. Munro) 著,隋麗君、張勝平、任美芬譯,《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COMING COMFLICT WITH CHINA),新華出版社 1997 年版。
52. [美國]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53. [美國] 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 著,張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54. [英國] 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A TYPOLOGY OF NATIONALISM),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 年版。
55.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 年版。

56. [美國]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 年版。
57. Hans Morthenthau 著，《POLITICS AMONG NATIONS, 6th ed.》,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年版。
58. Kenneth Waltz 著，《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79 年版。